

做海塘

严年丰



“做海塘”实则是围塘，就是在海滩涂上围起一座堤坝，拦住上涨的海水，造出一大批地来，这堤坝即海塘。最简单的海塘，干脆就是长长的一座土坝，这是筑在海水一般情况下涨不到的滩地上；稍微考究一点的，在土坝的外边（面临海水的一边）砌上石块，以增强土坝的牢度，能挡住涨潮时上涨的海潮；如今筑塘是用大卡车一车车地装着塘渣往海涂里填，临海的一边从底到顶砌上大石块，混凝土嵌缝，坝顶也是混凝土路面，可通汽车，坝的外面还抛上凹凸状的大水泥块，以缓冲海潮对大坝的冲力，大坝的里面也用混凝土搞成网格状，能挡住50年一遇，或者100年一遇的大潮水。

“做海塘”这项活，一般安排在冬季农闲季节。秋收冬种（秋收，主要是收割晚稻；冬种，则指种植油菜、小麦等）结束后至第二年春耕前这段时间，俗称“冬闲”时节，这时正是做海塘的主要时候。也正因为是冬闲时节，这段时期往往是冷空气南下频频，寒风凛冽，白霜似雪，间或雪花飘飘，路上小坑、路边小沟里还覆有薄冰。因此，“做海塘”时是够辛苦的。如果遇到大晴天，那可真是喜煞人也。

“明天都去做海塘啰！”当生产队长通知大家第二天的劳动内容时，我很兴奋，因为这是我下乡后还没有接触过的劳动项目。为了去“做海塘”，我先要准备好一样劳动工具：溜竹管。就是一根直径4厘米左右、长约1.8米的竹竿，其一端安上长约10厘米的一截竹管，竹管与竹竿成“丁”字形。这是“做海塘”的绝大多数人使用的工具。因天气冷，赤脚陷入稀泥会受不了的，还得穿上雨靴，最好是高靴，但很多人没有。因路途远，中午不能回家吃饭，还得带上饭包（将热米饭包在一块干净的布里，米饭里面还塞上一些萝卜干之类的小菜，隔着布将饭团捏紧）。一早，太阳还没露脸，天冷飕飕的，一队人就出发了，一路上说说笑笑，倒也热闹。呵出的气，形成了一条白雾带，随着一队人的脚步，飘忽向前。

冬之曲

刘千安

记得孩提时代（上世纪六十年代），每当严冬来临时，乡间的河里总是结着厚厚的冰，孩子们做着扔石子游戏，看谁扔的石块在冰上滑得远。住房的屋檐下会挂满一支支晶莹剔透的“冰糖”，玩得累了渴了，我们就用竹棒敲一支下来含在嘴里当冷饮吃。

过去的江南农村收完晚稻后还要种一季大小麦或油菜，虽然寒冷，但绿油油的麦子依然从泥土中默默生长，还是幼小的油菜屹立挺拔在寒风中，彰显着生机，点缀成冬天绿色的风景。田边的野草干枯了，而这时候农民就要把田边野草连同泥土一起翻起来堆在一起燃烧，待冷却后和其他农家肥一起为庄稼施肥，为庄稼做保暖工作，为来年的夏粮丰收打好基础。

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冷库还不是很多，渔船上也没有制冰机，沿海沿江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“冰厂”，所谓“冰厂”就是贮存冰块的仓库，仓库一般建立在有河（水田）的海边或江边，一半陷入地中，用砖和泥砌成，上面还用芦苇和稻草覆盖，实际上就是一个

要说“做海塘”这活，倒也不怎么难。在划定的每个生产队负责的地段，去掉了表层泥土之后，人们排成一队一队的，排头有一人用泥割（一种工具，主要组成部分是木柄和钢丝）把涂底海泥割成一块块长方体形状，第二个人把泥块捧到溜板槽内，第三个人开始握紧溜竹管，用丁字头顶着泥块顺着溜板槽往前推，后面的人一个一个用溜竹管顶着泥块往前推，让泥块在溜板槽内往前溜动（这称作撑溜），一直推到溜板顶，最后一个人就用手捧着泥块将它抛向该抛的地方。随着前面土堆的垒起，溜板上抬，人们用溜竹管顶着土块往上推的力也随之加大。溜板不够滑了，就用溜竹管丁字头上的竹管不停地往溜板上舀水，泥块遇到溜板上的少许水，滑溜溜的，推起来可省力多了。因我一开始对撑溜还生手，常跟不上前面一个人撑溜的速度，泥块在我面前叠起来了，出现了“叠溜”，让我手忙脚乱，大冷天满头大汗，还得由旁边的农民兄弟给我解围。干着干着顺手了，就好了。

就这样，一早出工，傍晚收工，中午就在工地啃着饭团。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，一天一天地过去，在几十支百多支队伍的前面，开始形成了拦海大坝的雏形——一长溜的土堆，高度有3米余。各生产队在负责地段的“做海塘”劳动，到此为止了。接下来的活儿，就由围塘指挥部组织专门施工队伍来完成，直到海塘按标准要求筑成。这条塘，时称“五七海塘”。

海塘围成后，生产队在围得的土地上分到了一块泥滩地，通过改良土壤，种上了棉花之类的农作物，并落实专人管理。不过这时，我已离开生产队日常劳动，到霞浦中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。据说，后来对“五七海塘”又进行了整修和加固。再后来，在这块土地连同原来的几个村的原址上兴建了几家大企业。

现今，我已退休在家。每每去霞浦、柴桥时，驾车在公路上，远远望见海塘以内一大片厂区里的楼宇烟囱、储罐塔林，就会勾起我对那段生活的回忆。

天然的保温箱。冬天时把河里和稻田里的冰块取来，贮存在“冰厂”，非冬季节渔船出海时就先到“冰厂”取冰用来给鱼货保鲜。最寒冷的季节正是住在海边的农民挑冰的最佳时候，那时冰厚量多，而收入是与你挑的冰重量来计算的。一般人们在天还未亮时就起床来到水稻田边，砸碎冰面，用手把一块一块的冰捞上来放到竹筐中，再挑到“冰厂”入库。乡间小道上人来人往，严冬的寒气已被淹没在热火朝天的劳动氛围中。

冬天是东海鱼汛的旺发季节，是渔民捕鱼捕蟹的旺季。海面上刺骨的寒风可想而知，那时渔船上的设备还没有现在这么好，站立在风浪之中的甲板上拉网搬货，两手经咸水浸泡海风吹晒而开裂，辛苦程度不言而喻。

严冬腊月虽然寒冷，但依然是收获的季节，弥漫冬天氛围的依然是劳动之歌，依然有着无可比拟的温馨和希望，充满人们脸庞的依然是喜悦之情！

社戏的记忆

王小飞

社戏是好些年没有做了。这在以前时常闯进我们童年生活的热闹事，而今已经变成陈年旧事，只有余音还在耳边萦绕。

记得做戏的地点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操场。这操场平时就是全村人的集散地，在农忙时就变成了晒谷场。一到农忙后或者年关，村里通常会邀请戏班子来做社戏。在戏班还没有来之前，孩子们便开始在操场上忙着抢占位置，大人们便托人给亲戚捎去看戏的口信。外公、外婆平时难得来我家住几天，只有做社戏那会儿才安稳住下。

戏班来了，给我们小孩带来了无尽的喜悦。第一站便是入住村里的仓库间。村人忙着给戏班搬行头，我们小孩也忙着献殷勤，但都被大人给笑着呵斥回去了。泄气的我们只好隔着窗户看着里面五彩斑斓的道具……

一切安排妥当，接下来就是安排戏班的吃饭和住宿，这是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。我们家那时条件还好，所以大队会经常让我们管一两个人的吃住。当大人们在寻思着怎样接待这帮客人时，我们小孩则巴望来的那位客人能好看点。很幸运的是来我家吃住的都是些巨角，印象最深的是一次来了一个“顶家旦”，据说是他们戏班里的顶梁柱。小时候不知道有多少漂亮，只知道其他的小伙伴都跑到我家来“偷看”她，弄得她有时候连饭都吃不安稳。

通常来说，白天看戏的人不多，而一到晚上，那看戏的人便从四面八方围聚过来。小孩子是不会在戏场里呆很久的，顶多是凑个热闹，与戏子们混个脸熟后，便不去搭理他们在戏中的“命运”。邻村的伙伴有一些是骑着自行车来的。在当时，有一辆自行车那可是件奢侈的事。我家就有一辆“永久”牌。伙伴们在密密麻麻的看戏人群中穿梭不停，比赛谁骑得快，惹得看戏的人骂声一片。母亲是不会让我去做那样的事情的，而我也不喜欢这样做，因为我还惦记着住在我家的“顶家旦”。除了她，我还喜欢戏班里的那帮鼓乐手，尤其是那位二胡手，他可是我的好朋友。每次在“闹头场”之前的那段时间，我总偎在他的身旁，恳请他为我拉我熟悉的曲子。他总是让我先给他哼一遍，而后便变戏法一般给我拉了出来，我对他真是佩服得不得了。戏开场了，他对我也特别优待，总在乐队旁给我安排一个位置。

与这些演戏的人离得那么近，我就可以更好地看到他们在幕后的故事。他们并不都是像在台前一样那么投入，只要一到后台，他们便会马上从戏里走出来，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。尤其是那些跑龙套的喽罗，更多的闲余时间是在后台说着笑话。那些戏里的主角，忙里偷闲地也会聊上一会儿。记忆中，他们多是来自安徽、黄岩等地方，十七八岁光景。看着他们说着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方言，一片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小时候的我不知道有多羡慕呢！

村里做戏是一件隆重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开销很大的事情。有时候，村里拿出的钱不多，于是就在全村凑。在戏班子演出即将结束时，村人如果觉得他们做得还不错的，就会主动提出再加演几天，通常这几天的开销就全由村人负责。记得那次的“顶家旦”的戏班子来做戏，原本说好五天，后来又加演了三天。直到现在，“顶家旦”的名号还时常被一些上了年纪的人提起。

因为做戏是一件开销很大的事情，所以村里一年做两三次戏已经很不错了。那段时光就成了孩子们的节日。当然，邻村也做戏，那时，我们就会缠着大人去看。大人们也很乐意在晚饭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去凑凑热闹。老人通常是在田间小道上行走的主力军。有一次，山岭那边的一个村里要演戏，我们缠了父母好几天，他们都没有答应。在最后一天，我们几个伙伴私下约好了早早爬山到了那里。记不起是出什么戏了，唱的也和平时听的越剧不一样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好像唱的是绍剧，音高，锣鼓的声音也不是很高亢。不过，印象最深的还不止于此。那次做的是扫台戏，据说是驱逐邪神鬼怪戏。看的时候很刺激，那斑斓的油彩勾画出的不同妖怪脸谱，伴随着略带裂音的锣鼓声，戏子们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，发出异常的怪叫，愈加显得阴森恐怖。最后，戏在妖怪的四处逃散中结束了。我们也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了回家的路。

此时的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月色倒很明亮，可如此好的月色中竟没有一个大人和我们同路回家。先头，大家还是说说笑笑，故意制造一些轻松的气氛，可到爬上了山头，想笑也笑不起来了。山风刮着松林，枝叶胡乱拍打着，间或传来几声鸟鸣，但足以传遍整个森林的鸟叫声。路此刻也显得崎岖不平，走在前面或后面的伙伴一不小心打个趔趄，就发出夸张的大叫，惹得我们胆战心惊。此时，谁也没有明说，但我想谁心里都有一种念头：那从戏台上跑出来的妖怪会不会在这儿出现呢？在快走到山脚时，我们都是跑着下来的。恰好迎面走来了放心不下的父母……

总第5542期 投稿邮箱 essay@cmb.com.cn

319



“你见到曹老师了吗？”我问。

“我到他的司令部去找过，没见着。”万同学说：“只见那个老农民缩在墙角打呼噜。”

这几天下来我突然明白。“民主”前面加一个“大”，就变成了“群众运动”。“群众”听起来很大，谁也不敢阻挡，其实又很小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这么叫。结果，一种“以小变大”的魔术出现了：任何人只要一说自己是“群众”，什么行为都被允许，旁边的人一起哄，更是成了“民心”、“民情”、“民意”。我眼前的一切残暴、死亡、荒唐，都这样产生。如果想自保，只能像曹老师，加入这种风潮。

我老实的爸爸，怎么能领悟“大民主”的这种秘密？

他狠命地要把老朋友们揭发的“历史问题”一个个说清楚，每天写着交代，一沓沓地交给造反派。造反派收下后叫他再写，却从来没有看过一页。他早就患有糖尿病，眼睛本来不好，这下眼疾大大发作，没法再写了。他要我代他写，我本想劝阻，却挡不住他近乎恳求的目光，就拿起了笔。

爸爸在我面前慢慢叙述着。我觉得，这已经不是爸爸向造反派的交代，而是上一代向下一代的交代。爸爸因眼疾要不断地用手帕擦眼泪，但也有可能是真哭。那些旧事，那些辛酸，那些死亡。

妈妈和祖母都在里屋。有时她们会突然说出一个短句来纠正爸爸的回忆。爸爸一怔，说：“你们还没睡？”

那时节已是深秋，窗外常常响起很大的风声。

一沓沓交代材料丝毫也没有改变爸爸的处境。后来有一个叫赵庸的同事揭发他十四年前曾为私营企业家说过好话，爸爸辩解说那是当时的陈毅市长说的。造反派说，陈毅也要打倒了。爸爸顺口说了一句，对这样的老人不应该“过河拆桥”。

爸爸的话刚落音，造反派里一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突然站起来，用尖厉的声音问爸爸：“你这句话，主语是谁？你是说谁对陈毅这样的人不能过河拆桥？”这个戴黑边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经过层层分析，严密地证明：有资格把陈毅这样的大人物当作一座桥可搭可拆的，只能是最高领袖。

因此，爸爸的罪名重了，当即就被关押起来。

好一个“主语”！当造反派一戴上眼镜，语法也就变成了刑法。这种“刑法”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：一个人一关押，“广大人民群众”在一天之内就能提供大量罪证，而且条条都“怵目

惊心”。连平日看起来最木讷的老大爷，都能随手扔出好几颗定时炸弹。妈妈去探望爸爸后回来说，爸爸的问题非常严重，看来已经没救了。至于到底什么问题，造反派不肯说。

爸爸被关押在他们单位的一个小房间里，只有星期天看守人员休息时才被允许回家拿点衣物。工资停发，每月发二十六元人民币的“生活费”，这是当时全国“被打倒对象”的统一标准。为什么是二十六元？很可能是每天一元，再扣去四个星期天。

当时我家是八口人。祖母、爸爸、妈妈、我、三个弟弟，再加上表妹。用每月二十六元要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里养活八口人，将会出现什么情景？

首当其冲，当然是极度的饥饿。妈妈每天都在寻找着家里一切可卖钱的物件。这样的物件不多，主要是她当年的陪嫁。其中有一些，还是外公、外婆结婚时留下的。妈妈知道每一件东西的来历，晚上背着祖母，摸着、掂着、捂着，有的还在自己的被窝里放一夜，第二天藏藏掖掖地去了旧货市场。那时候旧货市场的收购价低得难以想象，妈妈常常在那里放下、拿回，再讨价还价好几次。每次都以失败告终，她极其疲惫地走进了食品店。

那一点点食品，放在饭桌上谁也不动。祖母干脆说生了胃病，躺在床上。我怕面对这种情景，尽量赖在学院里不再回家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